

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传略

符泰光、王玲

王国兴（1894—1975）生于海南岛白沙县红毛峒番响村（今琼中县红毛区）排行第一，其父王政和是世代相传的峒长，清朝末被任命为管几个峒的大总管，后来因国民党将总管改为乡长。一九三八年，其父被国民党“抚黎局”抓去坐牢，备受折磨，出狱后不幸去世。其母也因悲伤过度而病死。父母双亡、家产殆尽，生活贫困，王国兴靠打短工和给汉商当挑夫过日子。

父死子继，这是黎族的传统，国民党委任王成顺当乡长，引起黎族群众的强烈不满，为了缓和矛盾，并利用王国兴的威望来加强统治，国民党改任王国兴当乡长。王国兴考虑到当乡长也许能使乡亲们减少一些痛苦，便上任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海南岛，国民党不积极抗日，逃到五指山区，他们横征暴敛，奸淫掳掠，甚至杀人取乐，把黎、苗族人民迫上了死路。他们对待王国兴也一样，有一次，因红毛乡的征粮未收齐，他们把王国兴吊在梁上，打得他遍体鳞伤，口吐鲜血，由于国民党惨无人道的欺压，引起了黎、苗族人民的反抗，终于爆发了由王国兴和王玉锦等人领导的白沙起义。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王国兴领导白沙黎、苗同胞举行声势浩大的起义，仅半个月时间，起义斗争的浪潮就席卷了整个白沙县，波及乐东、保亭、感恩（今东方县）、昌

江、崖县（今三亚市），陵水等黎族地区，九月底，义起队伍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反扑，被迫退到鹦歌岭，什寒山等地，生活十分困难，一切交通要道都被敌人封锁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王国兴毅然决定派人寻找共产党，几经困折，他们终于在临高县找到了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见到了冯白驹书记。从此，白沙起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纳入了琼崖人民抗日战争的洪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琼崖特委决定成立以黎族起义战士为骨干的武装队伍，——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由王国兴任团长，王国兴带领解放团，在白沙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配合琼崖纵队开辟白沙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八月，白沙抗日民主政府宣布成立，王国兴被任命为副县长。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国兴积极发动群众，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发展群众武装，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琼崖纵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五指山区的围剿，为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一九四七年六月，白保乐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王国兴被任为副主任。

王国兴始终不渝地带领黎、苗族人民追随共产党干革命，为海南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他极高的荣誉。一九四九年，党中央邀请王国兴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一九五三年五月，王国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州第一任主席和第一任州长；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第一、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

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副主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王国兴身兼数职，工作繁重，但他仍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他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对自治州的建设提出许多合理的建议，在农业方面，他号召黎族苗族人民学习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聘请潮汕地区老农到五指山区当师傅，指导黎苗族人民种水稻等，在交通方面，他建议修筑了海榆公路中资，活跃了山区经济；在工业方面，他极力主张开发山区资源，开办各种工厂。在他当州长期间，自治州兴建了油脂、肥皂、制糖、酿酒、炼铁、纺织等工厂企业，此外，王国兴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他带头学习文化，积极参加干部夜校学习，他亲自为自治州师范学校和卫生学校选定校址，经常关心这两间学校的工作。王国兴还十分重视人才，他多次到省内要求派来教师、医生、工程师、技术员和干部，并亲自到广州接回第一次分配给自治州的五名大学生，他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他们极大的照顾和支持，王国兴还非常注意培养民族干部，几乎每年选派一批民族青年和干部到民族院校学习。

王国兴在他当州长期间始终非常注意搞好民族团结，他曾多次讲过：我们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各族人民，要永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努力贯彻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农业生产，并欢迎汉族老大哥的帮助，不断提高我州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把我州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文明富裕的自治州而奋斗，王国兴号召民族干部向汉族

老大哥学习，他对汉族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非常尊重，他对苗族同胞也非常关心，和苗族领导人陈斯德亲如兄弟。自治州历史上遗留下的民族隔阂和矛盾逐渐被平等，团结和互相帮助所代替，出现了各族干部和群众间水乳交融的动人情景。

“文革”期间，王国兴被宣布为“自治州最大的走资派”“反动黎头”和“现行反革命”被非法关押在阴暗，潮湿的茅屋内。一九七〇年，王国兴被解放出来，进行“监护劳动”，王国兴已年过古稀，身受各种非人折磨，他仍然相信党，坚信党会来救他。一九七四年八月，王国兴的“监护”被解除，但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王国兴预感自己在世不久了，强烈要求回自治州看一看，回来后，王国兴大病不起，去广州检查，确诊为肝癌。他儿子向组织提出送他去北京治疗请求，他拒绝说：“不用了，侬回海南去”，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王国兴在海口病逝。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女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黎族人民的解放，你们要相信党，要团结汉族干部，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治州建设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为王国兴平反昭雪，恢复声誉，并拨专款，在他的家乡新建一所住宅，修建了墓地和纪念亭，墓碑正面写着“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之墓”。在纪念亭里，州府为其树碑立传，指出王国兴是“黎族人民领袖，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辉煌青史载勋名，人民永远怀念他。”高度赞扬他的革命精神。民族出版社也出版了《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一书（中元秀），肯定了他为民族和国家所做的卓越贡献。

红毛起义简述

琼中县志办公室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军侵琼，国民党王毅部逃进五指山区，对黎、苗人民横征暴敛，肆意杀害，引起了黎、苗族人民的反抗，爆发了红毛起义。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王国兴、王玉锦、王高定、王传立等十多人，在红毛乡德伦山开会，决定联合苗族实行大规模武装起义。会后，派员分别到白沙、元门、牙叉、细水、毛贵、毛栈、冲山、枫木、番阳、水满、加钗、营根、新市、大堆等地进行联络，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共同起义。九月，在红毛什亲山由王国兴主持召开五十多人会议，议定起义日期，攻打目标，队伍组织和准备武器弹药等工作。

一九四三年二月，各地首人一百多名，在红毛什合茂村集会，检查准备工作，确定八月十七日（农历七月十七日）丑时全面举行起义。八月十二日白沙一区人民抗捐抗丁，被迫提前起义。

国民党白保乐三县联络所所长李有美闻到起义风声，派兵扣押了王国兴等各乡领导人，王玉锦逃脱，召集起义群众于八月十七日夜击溃李有美部，救出王国兴等人。接着围攻国民党守备二团部王弼，打垮逃到毛贵一带的国民党感恩县府、昌江县府、乐东县府，以及驻大里的保亭县府，截击敌人援军二个连，攻克苏启辉中队，打跑国民党机关连。此后，起义群众分别撤上英哥岭、什寒山、毛兴岭、什兵山坚持斗争。十月，王国兴派吉有里等人下山找党，几经周折，才在临高找到琼崖特委。十一月，中共琼崖特委派武装工作组到什寒山、英哥岭领导黎苗人民坚持对敌斗争。从此，起义队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琼崖特委第五次党代会简介

冯尔山

一九四七年一月，琼崖特委、琼崖纵队部领导机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部队进入白沙县起义所在地——今琼中县什运区便文村，着手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四月初，琼纵将从各支队抽调的兵力和琼纵部警卫营合编为前进支队，向保亭、乐东进军。在第二、三支队的配合下，全部驱逐了驻在五指山地区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击溃并瓦解了地方反动武装，打通了与驻万宁、陵水、崖县地区的第三支队来往的路线，初步奠定了创建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基础。这对琼崖特委坚持长期斗争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全琼反“清剿”斗争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四月二十二日，琼崖特委准备召开第五次党代会的问题，写报告请示党中央。四月二十八日，中央电发《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琼崖党的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指示》。电示中提出九个问题供特委研究，做为“五大”的讨论内容。

五月九日至二十六日，琼崖特委在五指山的白沙县第二区红毛便文村（今琼中县什运区便文乡）召开琼崖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二十四人，冯白驹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林李明代表琼崖特委作关于三个月反“清剿”斗争总结报告。各临委向大会报告反“清剿”斗争情况。大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将琼崖特委改为琼崖区党委，选

举产生了区党委执委十三人：冯白驹、林李明、庄田、黄康、何浚、吴克之、史丹、符荣鼎、李振亚、肖焕辉、马白山、杨少民、陈乃石。候补执委六人：李独清、陈克文、陈克邱、陈说、陈武英、符思之。第一次执委会选举冯白驹、林李明、庄田、黄康、何浚五人为常委，冯白驹为书记，林李明、黄康为副书记。大会还决定将琼崖各临委改为地委，并通过《琼崖解放区施改纲领》。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并要求全党必须做好五项工作：（一）巩固和扩大白沙、保亭、乐东中心根据地，使其与各地联系，造成大块解放区，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特别是减租减息；（二）在军事上，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重建参谋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三）在民运上，确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诉苦，翻身运动，在军民兼顾、公私两利的原则下，发展生产合作社，给民众以实际的利益。组织农会、贫农团、保乡队；（四）在党的工作上，学习中央“七大”文件，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改进作风，改进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命令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加强党性观点和群众观点；（五）开展反特务斗争，加强分化瓦解和争取敌人工作。

这次党代会对粉碎蔡劲军所部的重点进攻，把琼崖解放战争推向新阶段，组织战略大反攻，为解放全琼做准备，有着重大的意义。

六月十四日，中央电发《中共中央关于琼崖党代会选举结果的批示》批准了琼崖第五次党代会全部人选。

同舟共济 患难与共

——忆在红毛尖岭上的斗争和后勤工作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白沙起义”（也称红毛起义）爆发了。半个多月里，以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和王玉锦为首率领的武装斗争浪潮席卷整个五指山区。当时，躲在五指山区的国民党琼崖警备司令王毅部惊恐万状，他们纠集了五指山区几乎所有的反共势力，对起义者实行血腥大围剿、大屠杀。成千上万的黎、苗族同胞倒在血泊之中。起义暂时受挫，但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起义的幸存者在王国兴、王玉锦的率领下，分别撤上鹦歌岭、尖岭、毛兴岭上坚持斗争。

我跟随王玉锦、王正成等首领在尖岭，上坚持斗争。当时，山上约有近百人的队伍。弟兄们劫后余生，不为敌人的凶焰所吓倒。多数人坚决表示：为了赶走“国贼”，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要坚持战斗下去。弟兄们在山上严密把守各个山头 and 交通要道，警惕地监视和打击来犯之敌。有一次，国民党王弼部纠集王政强、王政群等地方反动武装共三百多人，由保长王国浩带路，从四面包抄我尖岭山，妄图一举歼灭我起义部队。王玉锦、王正成等首领得悉后，马上分析敌情，布置埋伏。同时连夜赶制竹筒号角，吹号手分别埋

伏在四面制高点。当敌人进入埋伏圈时，随着一声令下，号角齐吹，火药枪集中射向敌人。敌人听到四面号声和密集的枪声，疑我布有重兵，便惶惶逃命。这次伏击战，击毙了保长王国浩，击伤几十名国民党兵。此后，敌人因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只是加紧在各个要道封锁包围，不敢贸然进犯。

由于敌人封锁，起义部队给养渐渐发生困难。首先是粮食不足。刚撤上山时，弟兄们多数是轻装简进，随身携带一点粮食。坚守几天之后，粮食已消耗大半。如果不火速解决粮食问题，起义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天，王玉锦首领找我谈话，他说“阿典，你为人忠厚老实，平时又少出头露面，敌人对你不大注意。你下山去动员乡亲们筹集粮食吧！”我开始有点犹豫，怕完不成任务。但想到大敌当前，上百名弟兄就要断粮挨饿时，便毅然接受了下山去搞粮食的任务。我乘黑夜摸回罗担、草文、南也等村庄。经过挨家挨户商量，多的每户拿出一秤（约一斗谷），少也有几升糙米，共筹到几百斤。趁天黑时，我又带领乡亲们绕过敌人岗哨把粮食安全送上山。我们撤上山后，国民党趁火打劫，村民生活也十分艰难。单靠向群众捐助是不行的。王玉锦、王正成等首领经过冷静思考后，决定主动出击，伺机向敌人索取粮食和武器装备，在斗争中求生存。一次，由我侦察并带路黑夜偷袭敌人大堆大法据点，吓跑了敌人一个排，缴获了二十多担米和其他一些弹药、物资。

在联络群众筹集粮食过程中，我动员家人模范带头，慷慨捐助。我和弟弟王有共不但积极为起义军捐粮食，还献出

两头牛给弟兄们改善生活。每次筹到粮食后，我的爱人、孩子等都主动承担脱粒加工任务，并争挑重担，把粮食送上山。当时正值秋收时节。为防敌人抢粮，我动员家人带头，并串连村民晚上下田抢割稻子，白天则在隐蔽安全的地方晾晒谷子，还把家里的“八人大米臼”扛到晒粮的地方，让爱人、女儿和村民中的青壮年妇女等前去轮流脱粒、加工。然后又同大家一道把大米装进草包或麻袋偷偷背上山。山上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许多人染上了疾病，对伤员的护理和照顾，我的家人更是关怀备至。一次，交通员王国养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打伤。我主动接受任务亲自把王国养接下山来医治。为了确保安全，我同家人把他安置在偏僻的芒度岭脚下，搭起一个小草寮让他养伤，并请来草医王生福专门采药给他治伤。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治疗，王国养同志便康复归队。

不久，由于敌人加强兵力侵扰，为了保存力量，王玉锦首领决定率领队伍撤到什寒山。这时，我和王有亲、王有加三人继续为起义军筹措粮食，负责后勤供给工作。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坚持每隔几天轮流上山一次，不断地给起义军通情报、送粮食，又使起义军能够在什寒山上坚持斗争好长一段时间。

（许志民整理）



难忘的鱼水深情

每一位老同志、老革命者都有一段难忘的回顾。在这里，我向大家叙述的是：抗战时期我在吊罗山苗村养伤前后的生活片断——

战斗中大腿负伤

一九四三年春，我琼崖独立纵队第三队根据整个斗争形势，决定在保亭开展新区工作。我和三支队参谋长兼三大队长符中权同志奉支队部命令，率领新扩编的第三大队向保亭五弓一带进军。到五弓后，我们立即投入六弓公路伏击战。这场战斗，布置周密，指挥正确，歼灭了日军一个班，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八支，俘虏日军一名。接着，我们又围攻盘踞在船竿（地名）的伪据点。由于时间仓促，侦察工作不够，我方在这场战斗中未能攻取据点而撤退。从此，敌人纠集加倍于我的兵力，密切注视我方在该地区的行踪，对我进行疯狂的扫荡。这时，支队部鉴于敌众我寡的状况，迅速指示由符中权同志带领两个中队向加茂的首、二、三弓一带撤退，同时加紧开展新区活动；由我带领一个中队继续在五、七弓坚持斗争。此期间，敌人抓住我方在该区尚未完备建立起各种组织的机会，经常向我驻地发起疯狂的袭击。我在指挥战斗中，右大腿被击中，血流不止，昏迷不醒，被抬上七弓大田岭一个临时设立的医疗所治疗。当时粮食和药物都很困难，食得多是野果野菜；治疗伤病员多是采挖草药。在山上一个多月里，我们就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生活的。

危急时黎胞搭救

革命离不开群众，尤其是在艰苦鏖战的岁月里。一天夜里

天地一片漆黑，山谷风偶尔吹来了阵阵寒意。突然，我在模糊中看见一个个窜进寮棚，那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声我闻得很清楚，他急急地对我说：“潘政委，卓盛利（我七弓乡长）叛变了，正带着匪徒要来取你的头去投敌领赏，你快点离开这里吧？”接着又说：“担架我准备好了，要把你抬到三十里地的吊罗山苗村去。”话音刚落，只见几名青年把担架放在我的床前，小心翼翼地把我安睡在担架里，迅速地抬出了临时医疗所。这人名叫陈亚书，是七弓（现保亭县什玲区什烦村人）乡人，其时四十余岁，人品正直，富有正义感。他十分同情和支持我部队开展新区工作，对我党同志情义笃深。他是听到卓盛利及其狗党的密谋后，才急促组织人马赶来的。他边帮我盖被褥，边吩咐前来担架的几位青年要注意照料我的腿疼，安全担架。夜，黑沉沉的，山路很难行走，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前头探路，七、八名青年轮换了几次，一路上都没有休息，也没有交谈，直至第二天拂晓，才在吊罗山外围的山麓停歇。约几分钟后，陈亚书便派了两名青年上吊罗山苗村同陈斯安等人联系。天亮后，苗胞的人来了（后来才知道，来抬我的人是陈其芳、陈其天、陈斯积、邓明春、邓明玉、邓明保等），他们同陈亚书等人聊了一阵便告辞了。就这样，我被抬上了密林深处，开始了在吊罗山苗村养伤的生涯。除政治干事重伤途中牺牲外，余下是我和大队部文化教员和公务员（女）三人抵达这里。早些时候，支队部军需主任周海东同志曾被派来苗村做发动工作，因此这里的群众基础好。陈斯德、陈斯安等苗胞群众都来探望我们，为我们装铺安置，安慰我们在这里好好养伤。

吊 罗 山 苗 村 养 伤

吊罗山起伏延伸，峭壁耸崎，森林茂密，古木参天。我

们居住这个苗村有三十多户人家，他们原居住在太平乡南仁芭、牙仿村，由于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压迫，流离往徙到吊罗山上来。山上的生活非常艰苦，没有水田，靠一把钩刀一把火，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吃的是以番薯、南瓜为主食，经济来源靠打野猪、捕山鹿、黄猿等山货。自从逼上吊罗山后，小苗村显得安静、孤寂，象是与世隔绝似的。他们很少“出门”，偶尔也到陵城去买盐、钩刀等，翻山头，绕山道，往返百多里地也得好几天。

尽管生活环境低劣，苗胞群众也总是尽到责任，确保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约有一个月后，周海东和苏辉地（后改名苏扬武）俩同志回支队部汇报情况，我们在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就更多了。生活上必需的盐块用光了，钱、米也接济不上。斯德、斯安俩兄弟知道后，来到我的茅房安慰说：“多么困难也绝不会让政委同志饿死，我们发动大家来解决，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一天后，苗胞各家各户都轮流送来了番薯、南瓜，有的把刚打到的黄猿肉送来；有的拉着我们到家里去用餐，那情景真使人激动。

生活越艰苦，我们同苗胞群众的感情就越深厚。记得一次，我到一位老大嫂家吃番薯，聊天中，她把苗胞在太平惨遭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苦难史向我叙述，请我把它编出琼剧来唱。我想：在部队时我曾当宣传干事，编琼剧是我的爱好，这太合我的胃口了。于是我满口答应，用了两个多小时编写出来。接着我就一曲一调地用琼剧板腔教唱，苗胞们唱后感到很有趣、很高兴。还有一次，我在一位苗胞家里吃番薯，房主是位善于言谈，但不识字的中年人，他对我说：

“潘政委，我苗人游居深山，世世代代没有文化，太吃亏

了，连写信都不懂，你们教我们认字吧！”我说：“认字写信有办法，我教你们。”于是，我花了五六天的时间编出一本信稿来，准备教他们认字写信。村里的青年人知道后都很高兴，纷纷建议盖一间茅房课堂，这个建议深受大家的赞许，只是个别思想保守的老人怕惹祸不同意。过了几天，驻陵城的日军士兵来吊罗山挖枫树苗，这件事才停下来。日军士兵来时，苗胞将我们转移到离村子远一点的深山里躲过了一夜；日军士兵走后才把我们接回村里来。

我在苗村养伤，外面的风声是很吃紧的。一天，斯德、斯安来我的驻地传递消息：“日本军官对我们去陵城买盐的人说，大田岭被打散的共军逃到吊罗山，若谁拿到一个人头悬赏光洋五百。”接着又说：“潘政委，你放心养伤好了，我苗人不取这个光洋。”在我养伤的二个月里，常有一位汉族小贩从太平挑货物来苗村做生意。苗胞们怕他知道回去泄露，便将我们转移到离村约两公里外的黄瓜园地里去居住。

远离苗村，我们的困难可多着呢！有段时间，文化教员和公务员病倒了，捡柴煮饭都成了问题。我的腿部受伤，行走很困难，也只得忍着疼痛，拄着拐棍好不容易走百余步捡柴火。要是遇上雨天，那个苦楚是难挨的。煮饭时，我不能坐，也不能蹲，只能用拐棍支撑着煮饭。苗胞们见我们远离村子，生活不便照料，便又将我们安置靠近村边但又从村子里看不见的山寮里。近了村子，许多苗胞群众都经常来探望我们，和我们热情畅谈。有时还拿来打到的猎物同我们一起用餐。就这样，我们在那里安全地度过了好些日子。

一九四四年初，支队部派周海东同志来接我们，我因伤口未愈，不能归队，文化教员和公务员继续陪我在苗村养

伤。记得周海东同志只交下两块光洋给苗胞替我们买米就走了。我十分感谢支队部首长对我的关怀，心里想：我的腿往后可怎么办呢！下次支队部派人来接我，还不能走那就麻烦了。于是我下了决心，每天拄着拐棍在山寨周围练习走路，跌倒了，再爬起。每次都增加走路的步数，坚持不断地练着。

安 全 抵 归 支 队 部

在苗村养伤半年，支队部首长和同志们非常惦念我们。一九四四年春派原三大八中队长赵登孚同志来接我们。我的腿伤虽说有些好转，但走路仍然感到很吃力。

翌日清早，苗胞们知道我们要归队了，斯德、斯安等苗胞群众都来为我们送行。苗胞们有的站在茅房门前含笑相送；有的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有的担心我的腿痛，用手抚摸我的腿部，那情景难分难舍。他们都默默地祷告，祝愿我们一路安全归队。我们一行七人（我和文化教员、公务员、老赵及前来接送的三名战士）简单地作了化装，在向导的带路下离开了苗村，踏上了归队的往途。我们途经敌占四区，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敌人的哨所，巧妙地通过敌伪炮楼据点，于第三天安全抵归我三支队部驻地。

光阴似水流年，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陈亚书等黎胞群众，想起陈斯德、陈斯安等苗胞群众舍生忘死，不畏敌人恫吓，不图光洋五百，勇于保护和照料革命同志的高尚情操，我的感激之情禁不住油然而生，这种在艰苦的岁月里结下的鱼水深情，将永远翻腾在我的脑海里……

选自《琼中党史通讯》86年第1期

政协琼中县委员会历届成员名单

第 一 届

主 席	黄心琼				
副 主 席	吉明崇 黄乃熙	邓文英	符远中	张裕义	许达忠
常务委员	王开盛 邓文英 林荣魏 黄心琼 苏玉香(女)	王居钦 邓运雄 张裕义 黄成耀	王国进 许达忠 张惠廉 符远忠	王家芳 吉明崇 赵天燕 盘大忠	王锡秀 陈德新 黄乃熙 邝永康
委 员	黄心琼 蒋应胜 邝丹英(女) 曾伟明 符史运 许达忠 梁崇胜 陈君恭 王兴胜	吉明崇 汪其冠 曾启生 黄泽楷 黄乃熙 卢文光(女) 周爱美(女) 林志强 王国进	王锡秀 张惠廉 曾启生 林诗鹤 林荣魏 陈德新 姚桂容(女) 盘大忠 王进章	王居钦 张伟篆 伍祥金 宋旋坤 陈昌强 陈德新 姚桂容(女) 林 英(女) 邓文英	符远中 黄立钧 张裕义 李 忠 曾 涛 邝永康 陈秀贤

王玉珠(女)	黄成耀	李忠兴	赵天燕
马升义	王玉芳(女)	凌绪尧	林烈河
谭昌任	王天文	王经孙	王明权
王家芳	赵兴尧	苏玉香(女)	陈善棠
陈日深	许茂西	李绍才	罗玉连(女)
王家业	庞凤轩	王文才	王春荣(女)
王尚忠	邓文富	陈业方	王开盛
王连英(女)	王家高	郑玉春	王兴福
王政富	王菊兰(女)	王文魁	林海敏
王政书	盘文英	王老罗	王玉林

第 二 届

主 席	王大忠			
副 主 席	陈振伦	陈秀权	陈昌华	黄永华
	卢文光(女)			
常务委员	黎建兴	王书盛	陈宏德	冯思徽
	吉有礼	陈日深	王开盛	梁昌棋
	刘美焕	王政书	王大谦	林志强
	陈振伦	陈秀权	陈昌华	黄永华
	潘先兴	卢文光(女)	陈如云(女)	
	胡洁冰(女)	王月金(女)	吴胜娣(女)	
	罗玉莲(女)			